

我国的外贸战略与工业化路径

张杰

摘要:发展中国家贸易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本国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发展路径。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并存性与交错性决定了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质。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表现在:一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在产业间的并存;二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在地区间的并存。我国的开放型贸易战略比较接近于世界银行所称的一般外向性贸易战略,其政策特征是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和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在我国的总体贸易政策中,出口导向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外贸战略；工业化路径；外贸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06)02-0013-04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基本判断

要讨论我国的外贸战略问题，首先就需要了解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具体说来，就需要讨论交易对方传递信息，以主动判断交易的信用风险。这种方法也符合系统科学中的“黑箱理论”。(2) 从根本上换了一个技术思路。本项目研究开创了对合同的信用风险进行实验室测试的研究新方法，开创了这方面研究的新的技术路线。目前国内外的实验方法，包括计算机模拟方法(蒙特卡罗模拟和系统模拟等)，都是运用生成随机变量进行统计分析来实验，而本实验方法却是博弈互动的。(3) 本研究方法大幅度地降低了企业的商业运营成本，使企业有可能在合同谈判与交易进行的过程中对信用风险进行自我测试，以帮助企业进行商业决策和控制风险，从而使之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具有商业可操作性。

(作者单位: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 [1] [美]菲力普·乔瑞. 风险价值 VAR[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5.
- [2] [美]克拉法. 信用风险衍生产品和风险管理: 含信用风险模型和信用管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注释：

- ① 实验过程从略, 主要采用的是对实验数据的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要了解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以及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国际经验,贸易战略的选择是一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并且是直接为该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只有了解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以及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才能从总体上真正弄清楚我国的外贸战略,才能真正把握我国贸易战略的选择及其发展趋势。

战后,由农业国演变而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求经济发展纷纷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我国的工业化是在相对比较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工业化起始阶段的工业基础是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我国起初的工业化战略受到了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直接影响,在工业化的起步上采取了类似于“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说是相类似,是因为典型“进口替代”战略的基本特点是以本国生产的工业消费品来代替原来的进口。但是,在前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下,我国的工业化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以便用国内生产的机器设备来代替进口,并用以装备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在实践中越来越演变成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局面。我国工业化战略的这一特点对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如前所述,我国的工业化是在比较封闭的条件下按照前苏联模式进行的,它的发展路径和产业顺序并不受制于国际分工的条件。一旦将之置于开放的国际分工环境中来加以考察,便知其与世界的一般发展有所错位,因而我国外贸的比较利益也错位了。例如,我国片面地发展了重工业,但在重工业上我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相反,我国可能最具有比较利益的轻纺劳动密集型产业却长期得不到长足的发展。世界的产业结构只是决定了一国比较利益所在的可能性,只有当该国此类产业同时处于国内发展的前沿地带时,才能够比较好地国际分工中来实现它的比较利益。这种发展的内外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

在开放经济中,外贸战略的选择要受制于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其中,一国工业化发展状况是个最为重要的内在条件。对内的工业化和对外的比较利益,以及两者的一致性发展始终是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于改革开放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缘故,致使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化了不少时间来调整经济,尤其是调整产业的结构。按照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位置,我国应该尽快发展轻纺工业并使它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随后才是逐渐跟上的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那么,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按照国际上的一般理论,判断一个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标准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工业结构变动这3个指标。按照国内某些学者(郭克莎,2000年)的观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判断应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主要依据,以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结构高度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并且认为,我国的工业化阶段大约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上半期或是处在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①

在另外两个指标中,我国的工业结构指标要优于产业结构指标,因为在工业结构中轻纺产品、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变动,无论从工业化的实际意义,还是从我国贸易战略的政策导向来看,都是更具有实质性含义。

根据行业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大小排序来看,在我国的工业结构中,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等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开始让位于冶金、石化和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并且电子及通信设备等偏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行业开始呈现出较高增长的趋势。因此,有理由认为,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正处在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中期阶段。如果按制成品、中间产品

和制造技术与设备这3个次一级的阶段来看,则处于重化工业中间产品的替代阶段。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这一基本判断,无论是对理解我国的产业政策,或是我国的贸易战略及外资政策,都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

二、中国外贸战略的综合特征

总体来讲,我国的外贸战略是建立在开放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上的,国内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和对外的产业比较优势是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内产业发展的多样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使我国外贸战略呈现出综合的特征,而不是单一的性质。

具体来说,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表现在:一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在产业间的并存;二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在地区间的并存。总体上,我国的轻纺产品早已进入出口导向的阶段;但我国的重化工业却还处在进口替代的阶段,确切地讲,处在重化工业中间产品的替代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开始了进口替代的阶段,这直接与我们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有关;并且,无论是重化工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都已经开始有制成品的加工出口。这种阶段的并存性与交错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后一阶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我国原先的轻纺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因而又开始了向我国内地的产业转移和向海外投资的扩展。这后一种向海外投资的扩展,就是所谓的“走出去”战略。可见,在产业间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同时并存的基础上,我国的外贸战略又开始增加了一个对外投资的新因素,这更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程度。

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除了产业之间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并存性以外,还表现为地区之间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的并存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正如W.W.罗斯托所言,“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可以发现在这个国家中的不同地区,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增长阶段都在这里同时并存。”^②因此,尽管我国的东部和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有了相当比例出口导向的成分,甚至开始了对外投资的进程,但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却还很需要大量的进口替代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工业基础,就是在东部已经相对过剩的轻纺工业也正是西部地区所急需的。因此,东部发达地区在将轻纺等成熟产业向外扩展的同时,同样也十分需要将这些产业向西部作阶梯转移。正是这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 and 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交错在一起,汇成了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特征。

在分析了我国外贸战略的综合性 and 并存性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我国外贸战略的政策导向。我国外贸战略的非单一性并不能推出政策导向的非单一性,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就更是如此。根据WTO的规定,成员的贸易政策应当保持全国的统一性,即单一性。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开放型贸易战略比较接近于世界银行所称的一般外向性贸易战略,其政策特征是贸易的逐步自由化和人民币汇率的实际贬值。贸易自由化的趋向说明我国贸易政策的逐步中性化,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则说明我国汇率政策的出口导向特征。可以这么说,在我国的总体贸易政策中,出口导向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确定了我国外贸战略选择之后,还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外贸增长方式问

题。我国外贸发展具有数量型、外资依赖和加工贸易三大特征。这种增长方式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具体表现为:对内的资源、能源、环境和人文环境4种约束;对外的贸易摩擦、汇率和知识产权三大矛盾。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及时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实际成效是缓慢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贸制度环境的改革滞后。

理论上,企业的微观行为是“个体理性”的;但是,这种外贸增长方式的总体结果却是“集体非理性”的,因而具有不可持续性。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企业选择“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成本”的数量型扩张则是相对有利的;选择“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渠道”的效益型发展方式是相对不利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度环境没有实质性改变时,不管这种制度好坏如何,当大多数企业选择数量型扩张时,个别企业选择效益型发展方式往往对自身是不利的。

因此,加快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途径是改革外贸制度环境。改革的关键是是企业选择效益型发展方式的得益要大于数量型方式,也就是说,要让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积极地选择效益型发展方式。

我国外贸制度环境改革的内容不仅应当包括汇率、出口退税、财政补贴、政策性金融等方面,还应当包括资源税、排污费、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等内容。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环境的改革还需要包括改变地方政府的游戏规则,例如GDP和招商引资等考核指标,以及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财税制度改革。

综上所述,我国综合的外贸战略在政策上仍然以出口导向为主导,这样具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外汇平衡。因为只有保持足够的出口,才能保证工业化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制造技术等进口的外汇供应,而不至于恶化国际收支。二是有利于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外向性经济需要开放国内市场,直接面向国际市场的竞争,降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这就有利于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从而也就有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讲,这种外向性经济的制度性作用具有比出口国际市场更深远而重要的意义。罗斯托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的末尾谈到,“我们对内向型政策向外向型政策转变的分析,仅仅成功地解释了实际达到的增长加速的一半,很可能另外一些重要的制度影响也包括在内了”。这也算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制度经济学伏笔。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 [1] 钱纳里等著,吴奇,王松宝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2]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 [3] 【美】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4] 黄田平.经济发展的结构与战略比较[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

注释:

- ① 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2003,(3).64.
- ② W.W.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